



FARMERS' DAILY

中国农网 网址: www.farmer.com.cn

2021年6月22日 星期二 农历辛丑年五月十三 五月廿八小暑 第11848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55 邮发代号: 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 zbs2250@263.net

习近平分别同刚果(布)总统坦桑尼亚总统芬兰总统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1日同刚果(布)总统萨苏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刚友谊源远流长,双方

一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去年以来,中刚双

方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携手推动复工复产,有关务实合作项目进展顺利,两国友谊和合作得到了深化发展。(下转第二版)

标题新闻

□□ 习近平向伊朗当选总统莱希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大跨越,中国历史乾坤再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中)

仲农平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本身就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然而,用什么样的视角去书写历史,用什么样的史观去看待历史,决定了我们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1921—2021,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震古烁今的伟业中,农业农村农民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历史长河静观之时似乎总是风平浪静,只有蓦然回首,才能真切体会它的波澜壮阔。

从牛耕人拉、看天眼色的传统农业到机艺融合、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一百年来,中国农业把“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拉直成大写的惊叹号,成为护佑现代化航船须臾不可或缺的定位盘、压舱石。

从“皇权不下县”的凋敝乡村到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一百年来,中国农村为全面小康的战略蓝图补上了最生态最要劲的一块,成为支撑民族复兴坚如磐石的大后方、根据地。

从被马克思喻为散状“马铃薯”的传统小农到当家做主、组织起来的农村居民,一百年来,中国农民正在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共建共享中,收获着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安全感。

百年巨变,弹指一挥,这是再好不过的回望契机。叩问史册,秉烛沉思,我们应该从百年党史的辉煌跨越中去寻回什么?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乾坤再造中去记取什么?

历史,比任何滔滔不绝的雄辩更能呈现真理,更能留下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朴素认知和深切关注。

“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析中华文明为什么绵延不断时,把重要一票投给了中国农村和农民。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民始终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孔子叹息的“猛于虎”的“苛政”无法根治;“一治一乱”的循环周期率无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无法跳出。

“农村凋敝,国本动摇”。进入近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乡村更是全面溃败,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饿殍枕藉,在无边的长夜里苦苦挣扎。

尽管仁人志士把悲悯目光落在乡村和农民身上,但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农村复兴计划”,都没有找到能够打开乡村与农民这把锁的钥匙。唯有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把农民问题的解决,放到了心上、扛在了肩上。

前后比照,才能辉映历史性抉择的真理光芒。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民这三组历史镜头最能说明,激活衰败大地的难题在彼时找到了答案——

1950年12月25日,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农民侯永禄的日记里留下了分地的记忆:“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立在田头时,人们禁不住热泪满面。”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拥有了土地产权的农民面貌一新,干劲冲天。

1986年12月23日,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壕村首次由农户代表推选村干部候选人,上级不划框子、不定调子。全村2000多名村民踊跃投票,大会一直开到后半夜,每到选举揭晓时总是欢声雷动,村里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这种掀大网式推选候选人的办法,就像“大海捞针”,被逼趣地叫作“海选”,此举也成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2018年9月27日,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

千多万浙江农民,站上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领奖台。新时代的中国农民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力,向全世界绽放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之光。

如果把这三个镜头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时空坐标系中考量,它的标注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这个视角反向打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何时,只要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权,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实践和创造,我们的事业就能开拓新局面,否则就会陷入被动、遭遇困境。

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相互成就的过程。

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就如一对连体兄弟,血肉相连分不开。中国革命的成功从解决土地问题发轫,从那时起,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就成为百年党史基本的逻辑线,也成为中国大跨越伏脉百年的生命线

仓颉造字,颇具深意。有“田”为基才能“富”,土地是财富之母,是农民生存与生活的根基。翻开历史,造就每一次太平盛世的因素很多,但要找出一个最为一致的规律,恐怕就要数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一套好的土地制度,往往具有稳定与发展的双重功效。

清朝,蒲松龄——“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民国,井冈山民谣——“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

诗歌让这种时空对比更为可感。

尽管孙中山早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就提到,“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解題思路放诸中心位置并付诸革命实践。

从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分阶段、有步骤地带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刷新了千年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把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回溯这段历史,背后的逻辑线异常清晰:土改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农民积极投身革命、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润生的总结更为有力:“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

黄炎培赴华东实地考察土改后,感慨土改的巨大成就:占新中国人口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此时,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站起来了”,仅仅一年零四个月。

查阅史料,有一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那时的农民,那就是“翻身”。美国记者韩丁在其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解释了“翻身”的涵义:对于贫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翻身对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作用是翻天覆地的,并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整个国家农业生产水平的跨越式提升。1949—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3.4%,年均增速15.4%,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了二战前最高的年份产量。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特别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直接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再一次变革。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规模经营也取得了比之前农民小块土地分散经营更多的效益,农民也从劳动和土地分红中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利益实惠。但由于之后过快地向高级社过渡,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非理性冒进,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急剧减少,很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

历史证明,如何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是革命、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线。当我们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农民获得土地权利,我们就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当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我们的事业就会出现挫折;而当我们再度回到这条生命线,再度解放思想、尊重农民、顺应农民、纠偏正误,我们又能重新获得农民的拥护,推进事业迈入新的跨越。

1978年春天开始,安徽肥西县几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绝收,秋种再不种下,来年的饥荒不堪设想。9月15日晚上,山山镇黄花大队召开会议,商量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制。“黄花会议”很快波及山南区乃至整个肥西县。而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西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手印决定大包干。这一幕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惶恐于饥饿,又恐慌于违反政策,双重折磨下的农民,把“球”踢给了领导者。“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1980年7月,习仲勋在广东先后到仁化、佛冈、从化等地就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对从化两个大队“产量承包责任制”试验的良好效果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

1982年1月1日,一份《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内的多种“包字头”责任制,作出了姓“社”的重大判断。作为改革开放后首个专注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的出台标志着“包”打天下被中央授权。

一“包”就灵,这种“灵”最直观地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4.07亿吨,相应地农民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5.1%,增幅是城镇居民收入的近两倍。

生产关系的调整并非一劳永逸,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又将迎来新挑战。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地”成为新难题。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要求愈加迫切。农村土地改革再一次呼唤制度创新。

红手印契约故事已经过去了38年,小岗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的春天,清风拂面,麦苗青青。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他说:“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就在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在于放活经营权。农民对承包地除了占有、使用、收益,还可以流转、抵押、担保,土地经营方式演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主体经营”的立体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史上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这也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又一个飞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重构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之后,再一次赋予农民在土地承包权上的重大保障。确实权、颁铁证,手握这一重保障的农民,进可自由流转,不会被土地束缚;退能稳定拥有,不必担心像历代农民一样失去土地。可进可退、进退有方。

邓小平在1990年畅想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正在逐步照进现实。截至2018年,涉及全国2838个县(市、区)及开发区、3.4万个乡镇、55多个行政村的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2019年,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新型经营主体超过320万家。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有人计算过,习近平总书记任在党的十九大上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会场响起了七十余次热烈掌声,这句给亿万农民吃下“定心丸”的话,收获的掌声时间最长。“长久不变”四个大字将护佑亿万农民敢想敢跑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大道之上。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而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就的这句经典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利器秘钥,也必将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牢记的真理。

三

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安全战略让我们在面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时候,都能够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历朝历代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2021年5月24日,湖南长沙开始放晴,上午10

时,袁隆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在堆如小山的祭奠花束中,一张卡片上的话格外引人注目:“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无需立庙,因为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自人间的怀念。”对于这位为粮食增产孜孜以求、奉献一生的老人的离世,也许有着饥饿记忆的国人更能真切体会其哀痛之深。

美国学者沃尔特·马洛里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饥荒的国度》一书中说到,发生饥荒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之间,所知的饥荒就有1828次。在某些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

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的饥荒和农民生活的脆弱性描述更为生动,他说:饥荒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有些地方,农村人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

中国曾经最为自豪的农业随着中华帝国的全面落后而衰败,到1840年,一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有人测算过,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公斤粮食、0.013公斤油料。吃顿饭,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当时的人们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对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严峻的大考。

天翻地覆慨而慷。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罕见的“十七连丰”,连续六年稳定在1.3万亿斤水平之上,人均占有量达到470公斤,连续多年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今昔对比,造就翻天覆地的因素有很多,有制度的绩效,有科技的力量,有投入的保障,但人的因素仍是其中的重要变量,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二法门。

“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陈云对土改激发生产力的分析有数据的坚实支撑: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44.8%。在随后几年农业生产中,土地改革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制度绩效。

即使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方式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但面对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仍然是“战天斗地”的动力源泉,开启了以水利化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农业现代化探索。上世纪50—70年代,从“人工天河”河南林县红旗渠,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河北遵化沙石峪,再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西昔阳大寨村,各地农民以特有的苦干实干精神,用铁锹、条筐、独轮车,肩挑手推,修筑起大大小小数万水利工程施工,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生产更是插上了制度创新的翅膀。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有人总结,中国粮食和农业要搞好,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这些外因也终究需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来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然而,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不高,用工等成本又不断抬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谁来种地”特别是“谁来种粮”的问题亟待破解。中国农民从经营体系入手进行了又一次创造。

上世纪90年代起,每到夏收时节,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就要开始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这些“钢铁麦客”从5月份河南南阳开始,沿着小麦成熟的速度和方向,有条不紊地一路向北,到8月底刚好赶上黑龙江小麦收获。这种跨区域专业化机械调度,使中国3亿多亩冬小麦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先河。

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的功劳簿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有一席之地。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例,在四川广汉,全程托管的农户,每亩生产成本比自己耕种减少了57.5%,水稻单产提高了50公斤以上。

农业社会化服务除了对粮食的贡献,在生产关系层面的深层变革也值得称道。在不流转土地、保持原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破除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了经营规模化、组织化;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得以安心外出务工或从事二三产业。

回顾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粮食总产量增加近5

倍,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困扰历朝历代的饥饿问题一去不复返;粮棉油糖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低质低效的减下去,优质绿色的增上来,“米袋子”越来越丰富,“钱袋子”越来越充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使我们即使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横扫全球的风险挑战,仍然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四

基层民主进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源自农民的大胆探索,而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对农民权利的尊重、对农民福祉的维护,让农民的创造力成为推动历史大跨越的强大动能

河北省安平县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前,高大的红色石柱上,一团熊熊火焰燃烧不息。

1923年4月的一个夜晚,北大红楼一个僻静处,李大钊郑重地对学生弓仲韬说:“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一批仁人志士来推动,你回家乡安平一带农村发展组织进行斗争,怎么样?”

“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不负重托!”当年8月,弓仲韬回到家乡台城镇建立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播下第一粒火种。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小农都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马克思曾断言: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能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好像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是彼此分离的。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种皇权下的乡绅自治结构,形构了中国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宗法文化制度对农民进行强控制的超稳定的封建社会形态。

尽管“开发农民的力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上一股浪潮,但各式各样的乡建运动,却因没有找到土地这一提纲挈领的“牛鼻子”而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局告终。

直至中国共产党把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并通过土改,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根本上重塑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明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和治理技术,使农村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

难怪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叹,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组织起来的农民告别了一盘散沙,传统的乡土社会让位于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的现代农村。这是中国农村跨越千年的大变迁,也是中国农村从传统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

其实,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日益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相衔接和融合,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也发挥了积极的乡村治理作用。但由于后来脱离实际、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杜润生所言:“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怕。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

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的诉求,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又一次“箭在弦上”。樟树不语,见证历史。1980年2月5日,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果作屯村口的大樟树下,38岁的生产队长韦焕能组织召开村民大会,85户农民用卷烟纸作选票、竹米筒作票箱,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刚刚吃上饱饭的合寨村村民,在懵懵懂懂中定下了村委会的名称、架构、职能和选举方式,播响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鼓”。

在农村基层通过群众自治,实行直接民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彭真对这场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人管理问题的民主试验予以高度评价。

新生物种一经诞生就向神州大地散发出春天的信息。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实现了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大张旗鼓推进的历史性跨越。(下转第二版)